

超越低成本优势： 中国经济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Growing beyond the Low Cost Advantage: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Avoid the Middle Income Trap

中文摘要

庄巨忠
保罗·范登博格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超越低成本优势：中国经济如何 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¹

(报告摘要中译本)

庄巨忠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

保罗·范登博格

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本报告探讨中国应如何应对面临的问题、保证经济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高速增长、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达到在 2030 前加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目标。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但在成功的同时也面临许多挑战。首先，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还只有 5,000 美元，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才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其次，中国三十几年的增长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其低成本优势，而未来几年因接近“刘易斯拐点”及人口老龄化而引起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意味着低成本优势对增长的贡献会逐步减少。增长将越来越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推动。再次，由于改革尚未完成，中国经济存在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如增长来源的失衡、收入差距的扩大、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与供给的制约、环境的恶化等，同时面临日渐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这些问题如不加以有效解决，有可能成为产业升级的重大制约。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三方面的对策。一是要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知识型经济的发展；二是要深化改革，包括企业、要素市场与财政体制的改革，并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三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和健全的金融系统，社会的和谐与包容，环境的可持续性，和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如果这些对策能够加以有效实施，中国有望在 2030 年前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¹ 本文是亚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局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合作进行的一个研究中国中长期发展趋势与政策选择的课题总结报告的中文简译。庄巨忠为亚行经济研究局副首席经济学家。联系地址：jzhuang@adb.org。保罗·范登博格为亚行经济研究局高级经济学家。联系地址：pvandenberg@adb.org。黄益平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联系地址：yhuang@ccer.pku.edu.cn。作者在准备此文中得益于课题组成员所提供的背景材料，在此表示感谢。文中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而不代表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

报告摘要

1. 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因素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近百分之十。高速的增长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人均每天消费 1.25 美元国际贫困线计算的贫困人口从 85%下降到了 13%左右。人均预期寿命从 63 年增加到了 73 年。5 岁以下的婴儿死亡率从每千人 65 人下降到了 18 人。中国由一个封闭、贫穷、以农业为主的低收入国家变成了开放、强劲、以现代工业与服务为主导的中等收入国家。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大大提高，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成就被称作为奇迹并不为过。

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归咎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第一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为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提高了资源利用和配置的效率。对外开放使企业拥有巨大的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并可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第二是中国所具有的低成本优势使其制造业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不但劳动力便宜，其它生产要素如资本、能源等的成本因改革未到位也相对低廉。第三是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有效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市场失灵”如信息不对称、协调不完善等问题。除了这些因素以外，很高的储蓄率、对基础设施的大幅投资、良好的人力资本与人口红利、稳定的宏观经济与社会环境、以及在改革初期就拥有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等也是中国经济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中国经济在成功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首先，人均国民收入还只有 5,000 美元，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才能接近发达国家水平²。其

² 根据世界银行 2011 年的划分标准，人均收入 1,025 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1,026-4,035 美元为低中等收入国家，4,036-12,475 美元为高中等收入国家，12,475 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

次，未来几年中国因接近“刘易斯拐点”和人口老龄化而引起的劳动力成本以及要素市场改革可能导致的资本和能源等价格的上升意味着低成本优势对增长的贡献会逐步减少，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以提高生产率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再次，近几十年来，由于改革尚未完成，高增长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有效解决，有可能成为产业升级的重大制约。许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也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2. 中等收入陷阱与国际经验

许多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目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18 个国家中，12 个在拉美，3 个在东南亚，即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这 18 个国家处在中等收入水平至少已有 40-50 年。但是，也有很多国家与经济体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比如东亚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它们用了 30-40 年的时间完成了由低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过渡。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通过不断的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从依赖低成本优势走向生产高价值产品。低收入国家通常拥有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刘易斯称之为“无限供给”。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城市工业与服务业的扩大不会导致工资的上涨。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以低成本优势进行竞争。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农业剩余劳动力慢慢减少；当接近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时，即从劳动力过剩转变为劳动力短缺时，工资就会快速上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必须通过创新与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它们能够支付更高的工资。如果不能实现产业升级，经济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因为工资上涨失去了低成本竞争优势，

无法与低收入国家在低端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因为产业不能升级，无法与高收入国家在高端市场竞争。

国际经验表明，产业升级需要一大批高效和勇于创新的企业。同时，政府必须提供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这包括经济与政治的稳定、良好的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有效的市场竞争与价格信号、健全的金融体系，社会的包容与和谐、法治与对产权的保护、实施得当的产业政策、以及一个廉洁、有效、注重经济发展的政府。东亚奇迹国家与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大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另一方面，宏观经济不稳、债务危机、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政治不稳等因素被认为是许多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东南亚，菲律宾在很长时期内的情况与此类似。泰国和马来西亚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到目前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投资还未完全恢复。

3.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中国经济在成功的同时面临许多结构性问题，而这些问题使得中国也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第一，技术与生产率水平跟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尽管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很快³，在 2009 年，根据市场汇率计算，其水平只为美国的 10%左右，用购买力评价法计算，也不到美国的 20%。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但大约 80%是加工贸易，在中国创造的附加值非常有限。产业升级需要一大批勇于创新的企业，但中国民营企业的规模还相对较小，而国营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激励机制有待改进。⁴ 尽管中国是全球

³ 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达到了将近 8%。在同时期，韩国为 5.7%，马来西亚 3%，泰国与菲律宾 2.6%，印尼 2%。

⁴ 2011 年中国国营企业的资金报酬率为 6%，民营企业为 13%，外资企业为 10%。许多生产率的实证研究表明，国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比民营企业要低大约三分之一。有关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表明，用

的制造业中心，中国的国际品牌数量还很少。全球排名前列的中国大企业主要集中在资源业、金融业与建筑业，而制造业的大企业数很小，远远低于日本、韩国及许多发达国家的数量。⁵ 尽管中国的研发经费近年来增长较快，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⁶

第二，工资上涨与低成本优势的侵蚀。在过去三十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大因素中，低成本优势对未来二、三十年增长的贡献会逐步减少。近年来中国工业实际工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自 2003 年以来，沿海城市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在接近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导致工资上升。中国的劳动力也正在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人口老龄化会增加社会负担，而这一负担最终将由企业承担。为了解决经济结构的失衡，政策调整也会导致其它要素（如资本、能源、其它资源）价格的上升。要素价格的上升需要中国加速产业升级、消化成本上升，以保持竞争力。

第三，经济增长来源的不平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伴随着经济结构的不平衡。一是内需与外需的不平衡。⁷ 二是消费与投资的不平衡。消费占 GDP 的比例由 2000 年以前的 60-65%下降至 2010 年的不到 50%。同时，投资占 GDP 的比例由 37%增长到了 48%。经济结构的失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以高投资为例，这在追求高速工业化的国家通常都会发生，比如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但与这些经济体历史上处于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时的投资率相比，中国的投资率是非常高的。投资率高的一个原因是要素价格的扭曲

人均专利、新产品占总产品的比例、人均研究与开发经费等指标来比较，国营企业在创新方面的表现也不如民营企业。

⁵ 在 2010 年 Fortune 500 强企业中，中国有 61 家入选，但在排名前 20 的企业中，只有三属于制造业（全部为汽车制造企业）。这三家企业的总收入加起来占中国 GDP 的比例为 3%。相比之下，排名前 20 中制造企业的总收入占 GDP 的比例英国与美国为 5%，日本为 18%，韩国为 52%。

⁶ 中国的研发经费占 GDP 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0.8%增加到了 2008 年的 1.5%。在 2008 年韩国与日本这一比例为 3.4%，美国，德国与新加坡为 2.7%左右。

⁷ 净出口占 GDP 的比例由 2000 年的 2.4%增加到 2007 年的 8.8%，2011 年回落至 2.8%。

（如低利率）增加企业的盈利，而企业把盈利用于投资。国营企业与地方政府过分追求高投资与扩张的行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投资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过度投资会导致投资质量的下降，产能过剩和不良资产的增加，长此以往，影响经济增长。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创造了“东亚奇迹”。通过低成本优势和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与东亚奇迹国家相比，中国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与这些国家处于中国目前发展水平时对净出口的依赖度相比要高得多。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增加一个国家对外部经济环境的脆弱性。持久的贸易顺差也会加剧全球的经济失衡，并导致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要素价格的扭曲，一方面提高了出口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会削弱中国企业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力。

第四，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分配相对平均，人均消费的基尼系数仅为 30 左右。根据亚行的分析，2008 年中国人均消费的基尼系数增加到了 43.4。这在世界范围内属于中等偏高的水平；在亚洲范围内则属于较高的水平。相比之下，许多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时，基尼系数也有上升的趋势，但幅度没有像中国现在这样大。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城乡之间和城镇内部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所致。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居高不下。

急剧的经济转型（包括技术进步，全球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必然会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但是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反映了经济改革尚未完成，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与要素价格扭曲的事实。一个例子是由于户口制度，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待遇大不一样，特别是在各种福利待遇方面，包括医疗、子女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同时，因为市场机制尚未完善，还存在大量行政干预资源配置的情况，产生寻租机会。治理方面的缺陷导致机会的不均等。而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不足

也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很高的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不利于消费的增加,从而影响增长的可持续性。

第五, 能源与水资源的制约与环境的可持续性。高增长也给中国的自然资源与环境造成了很大压力。由于需求的增加、污染、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水资源短缺将越来越严重。根据亚行的估计,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2030年中国水资源的短缺将达到10%左右。⁸在能源方面,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但就人均消费而言,中国的水平还低于世界平均,这说明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将继续增加。中国是一个产煤大国,但是煤炭储量集中在北部和西北部,而需求主要来源于东南沿海地区。煤炭运输能力已经成为扩大生产的一个瓶颈。电网输送能力的限制与水资源的短缺也使煤变电的方案受到限制。中国2007年13%的总能源消费来自进口,2008年开始进口煤炭,2009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原油进口国。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如果增长方式不变,中国2035年的初始能源总需求与2008年相比将增加一倍;原油净进口将达到中国原油消费总量的85%。这些数据表明,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能源供应与安全也将成为中国未来增长的一个制约因素。据估计中国在2008年排放了65亿吨二氧化碳,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来源。而经济与人口的增长意味着二氧化碳的排放将继续增加。

第六, 日渐挑战的外部经济环境。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高速增长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需要中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以保证有一个稳定与和谐的外部经济环境。以下几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一是贸易摩擦会继续增加。最近几年中国已经成为各国采取歧视性贸易措施的首要目标。二是中国的汇率水平与贸易顺差也被视作是国际经济不平衡的原因之一。三是中国对资源的需求经常被视作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中国对外投资与外援也备受关注,有时被认为是获取资源

⁸ 也有研究估计缺口为30%。

的手段。四是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经常受到质疑。五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也是各国关注的一大问题。

4. 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选择

基于对中国目前所面临问题和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的分析，本报告认为，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考虑三个方面的对策。第一是要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知识型经济的发展；第二是要深化企业，要素市场与财政体制的改革，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和健全的金融系统，社会的和谐与包容，环境的可持续性，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等等。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只有实现产业升级，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人均收入；而合理的经济结构与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必要条件。采取这些对策意味着要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包括依赖低成本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增长质量与速度的关系、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等。根据以上思路，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考虑下述措施。

第一，增强企业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营造鼓励与支持产业升级的环境，推动知识型经济的发展。

深化企业改革以增强其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中国在继续引进外国技术的同时，应通过深化企业改革，加强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与动因。国企与民企在创新方面的障碍不同，需要不同的对策。国企规模较大、资金相对充足，但创新的激励机制不强。国企改革主要是进一步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完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其能完全以商业化经营。同时加强对国企的监督

与绩效评估，防止腐败现象。国企高管应通过市场招聘，择优选用。上市国企可增加公众流通股，实现股权多元化。对于自然垄断行业，政府须加强市场监管如价格管制，以防止垄断利润。民企激励机制较强，但规模较小、融资渠道狭窄、自身研发力量弱。对民企要创造使其能够与国企进行公平竞争的环境，特别是在市场准入、融资、与税收方面。可以通过鼓励合并与收购，扩大企业规模。对外企则主要是给予国民待遇，鼓励公平竞争，并保障其知识产权。

营造鼓励与支持产业升级的环境。营造一个鼓励、引导、支持与保护创新的环境需要政府多方面的努力。一是完善市场机制，如确保公平竞争，保护产权与合同各方的权益，培育与提倡商业诚信，建立有效的企业破产制度等。二是支持公共与基础科技的研发。三是通过产业政策（如税收，融资，信息，高新技术园区等）对自主创新（包括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加以鼓励、引导、与支持。四是建立鼓励冒险、分散风险的风险投资制度，为自主创新提供金融支持体系。五是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新进行保护⁹。六是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如基础设施，弥补市场失灵。

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推动知识型经济的发展。创新与产业升级需要有充足与优质的人力资本作为后盾。可以考虑以下措施。一是进一步增加国家对教育与科研的投入，培养更多的科技人员¹⁰，同时要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二是继续推进教学与科研体制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完善高校教学与科研质量的评估机制。同时增强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 and 市场的联系，使高等教育与科研更加符合市场需要，提高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率。三是鼓励与改善民办教育发展环境。四是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

⁹ 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尽管有很大进步，还有许多方面有待改进。跟据世界经济论坛报告，在全球排名中，中国在一百多个国家中位列第 47，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也低于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如南非（30），马来西亚（31），与斯里兰卡（44）。

¹⁰ 2005 年中国每万人的科技人员只有 14，远远低于韩国的 76 与日本的 102。

第二，深化要素市场与财政体制改革、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成功实现了产品的市场化，但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仍然很低。要素价格的扭曲、要素流动的限制导致了资源分配使用的低效、经济结构的失衡、收入差距的扩大等。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一是要推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包括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劳动力流动的阻力，同时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如劳动保护，最低工资，集体协商与失业保险等，兼顾就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二是要进一步推动金融业的市场化，包括利率市场化，消除资本价格的扭曲；鼓励民营资本的进入，实现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扩大对中小与微型企业的融资渠道与发展农村金融，以促进金融的包容性；加强金融监管，控制金融风险，并建立一个有效的金融安全网包括债务重组机制与存款保险制度；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等。而资本项目开放则应根据国内金融改革的进程循序推进。三是要继续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促进土地流通与土地市场的发展，使土地定价机制更加合理，兼顾农民利益与城市化用地的需要。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近年来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了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保证财政的稳定和可持续性，提高财政体制的效率与公平性，可以考虑以下改革措施。一是在支出方面，优化支出结构，增加对公共品与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投入。二是在收入方面，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加速与推广增值税的改革，改革财产税，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并增加国企利润的收交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的份额等。三是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方面，进一步理顺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关系，规范转移支付体制，增加地方财政的透明度，加强地方债务的管理。四是在预算管理方面，建立完整的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和社保预算的预算体系。

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有助于产业集聚和升级,生产率的提高,服务业的发展,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增加,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由之路。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与收入水平类似的国家相比程度偏低,这与中国的国土特征,经济结构和对要素流动的限制有关。进一步推动城市化进程可以考虑以下改革措施。一是继续探索适合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充分考虑资源,环境,人文,历史等因素与约束条件。二是理顺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所能够控制的资源,使城镇管理以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主要目标。三是制定一套有效的制度与法规保证在城市扩张中对征用土地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四是把服务业的发展与推动城市化联系在一起,保证城市充分就业。五是改革户口制度,让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在住房、就业、社保、教育等方面享有同等的机会和待遇。六是探索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城市规划与发展模式。七是保证城市化有序进行,防止与控制城市贫困现象,创造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保障性住房制度。

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也相对滞后¹¹。这与服务业市场开放不够,城市化程度不足,宏观政策上对制造业的倾斜等有关。未来几十年,服务业不但要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来源,它还是创造就业的主要途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助于提高其他产业的生产率,促进产业升级,而社会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可以考虑以下措施。一是参照国际经验,对还未开放或还未完全开放的服务业(如教育、医疗、金融,电信等部门)考虑进一步开放,引入市场竞争,同时实行有效的市场监管,保护消费者利益。二是把服务业的发展与推动城市化联系在一起。三是推动生产性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的发展。四是消除宏观政策上对制造业的倾斜,如使人民币汇率更有弹性,在税收与信贷方面对服务业和制造业一视同仁如改服务企业的营业税为增值税。五是推动服务业对外贸易的发展。

¹¹ 2010 年中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 44%, 低于马来西亚的 46%, 菲律宾与印度的 55%, 更低于韩国的 59%, 日本的 73% 和美国的 80%。

第三，提倡机会均等，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增长的包容性。

使所有人都能有公平的机会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得益，从而缩小收入差距，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一环。

缩小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推进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以进一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同时，要给进城的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居民在工资、社会福利、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同等待遇。这需要逐步改革户口制度。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还要增加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加速农村建设。目前的地区收入差距除了自然条件的因素外，主要是由区域间资源配置不平衡所造成。这一方面与经济过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地区间资源流动的限制与发展政策的倾斜有关。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措施包括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增加对低收入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推动全国市场一体化、促进沿海地区产业向内陆省份的转移、消除劳动力从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流动的障碍等。

增加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并保证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增加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并保证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是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涵。在基础教育方面，要加大政府对义务教育、农村教育和落后地区教育的投入，推动教育机会公平化，并适时实现高中义务教育。¹² 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方面，要进一步增加公共投入，扩大公共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在社会保障系统方面，一是要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系统。二是要进一步扩大社保的覆盖率与覆盖面，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三是要鼓励发展商业医疗与养老保险，作为对社保体系的补充。四是要确保社保体系财政的可持续性。

¹² 据估计 2010 年中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为 8.17，低于新加坡的 9.14，马来西亚的 10.14，中国台湾的 11.34，韩国的 11.85，但高于印度的 5.12 和泰国的 7.5。

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实现包容性增长也需要有一套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与大多数 OECD 国家和许多亚洲国家相比，中国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所占比率很小。税收对收入的调节作用还很有限。可以通过扩大税基如降低最高边际税率的起征点、加强征税管理等手段增加个人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的份额。同时，逐步实行综合征税，以提高税制的渐进性，使其更加公平合理。

加强法制建设，确保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以规范市场秩序、企业行为和政府治理，从而有效地保护公平竞争与私有财产，保障劳动者与消费者的权益，消除社会不公和歧视，预防与杜绝腐败。

第四，推动绿色经济，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保护环境。

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为了避免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一是要加速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以降低增长的资源使用强度。二是要利用价格机制与税收杠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三是在水资源领域进一步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减少污染，同时增加对水利建设的投入，加强对水资源的综合管理与优化分配；四是在能源领域鼓励开发与推广清洁能源、新能源、与能效技术，同时鼓励民营企业在这些领域的投资。

保护环境。推动绿色经济的关键一环是控制与减少各种污染的排放。在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方面，中国在 2010 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暖大会上已经承诺到 2020 年把二氧化碳的强度比 2005 年降低 40-45%，并把非石化燃料在初始能源消费的比例增加到 15%。同时，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要把能源使用强度降低 17%，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 18%。为了实现并超过这些目标，中国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进一步推进能源价格改革、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也可考虑征收排放税；二是利用市场机制如建立碳排放许可证交易市场降低减排成

本；三是推动技术创新、发展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四是提高全民推动绿色经济、保护环境意识；五是加强能源方面的国际技术与知识交流、合作；等等。

第五，保持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的稳定。

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基本稳定是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成功地避免了高通胀、高失业率，并有效应对了两个来自外部（地区与全球）的经济危机，使经济增长避免了大幅下滑，对地区与全球的经济复苏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保持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基本稳定也将是中国将来二十年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之一。

中国能保持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基本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在宏观管理中行政手段使用的程度还相当高，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还有限，而中国对资本帐户的开放态度也比较慎重。但另一方面，这些也不同程度地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不管是深化改革的需要，还是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需要，中国的经济管理将要更多地依赖市场手段，人民币汇率将需要更具弹性，金融业将需要进一步走向市场化如让利率更多地反映市场供需情况、银行与金融机构更加遵循商业化原则、更自由地让民间资本进入，等等。而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在进一步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中国必须保持宏观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基本稳定

在财政方面，虽然中国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例不高，还拥有大量国企和土地等资产，但仍需推进财税体系改革，确保财政的长期可持续性。具体可考虑以下方面措施。一是进一步改革税制，使其更加公平合理，为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提供保障，同时也要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二是建立完整的包括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和社保预算的预算体系，监督规范预算外资金。三是加强政府债务尤其是地方债务的管理。

第六，加强国际与地区经济合作，提倡共同与和谐发展。

一个和谐的外部经济环境对中国的持续增长与发展至关重要。可以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进一步强调共同发展，并考虑以下措施。一是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充分考虑外溢效果，同时增加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建立与增强与贸易和经济合作伙伴的互信。二是积极参与 G20、APEC、ASEAN+3 以及其他多边与双边国际与地区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增加对国际经济政策与治理结构的影响力。三是增加内需，加强南南经济合作，支持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四是增加对全球公共产品如预防气候变暖等的贡献。

5. 展望 2030 的中国经济

上述政策措施如果能够得到有效实施，中国将有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并在 2030 年前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假定中国能成功实施产业升级，本报告利用经济模型对 2030 年的中国经济做了情景展望。模型假定：第一，中国的投资率从目前的 44%（2007-2009 年的平均水平）逐步降至 2030 年的 35%；第二，劳动力总量到 2016 年达到 7.895 亿的峰值，然后逐步降至 2030 年 7.363 亿，这是基于中国人口到 2026 年达到 13.956 亿的峰值，然后在 2030 年下降至 13.91 亿（联合国的预测），劳动力参与率从目前的 79.7%下降至 2030 年的 76.7%；第三，年平均的趋同率（rate of convergence）为 1.8%；第四，人民币实际水平每年以 1.2%的速度升值。

在这些假定下，中国经济有潜力在 2010-2020 期间把年均 GDP 增长率保持在 8%，2020-2030 期间把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6%，2010-2030 期间把年均增长率保持在 7%左右。这样的增长速度比 1990-2010 期间 10%的年增长率要低。一个主要原因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趋同的作用会越来越小，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下降。资本积累的贡献也会下降。而劳动力将出现负增长。在

2010-2030 期间 7%的年均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将会是 4.6 个百分点，资本的贡献将是 2.6 个百分点，劳动力变化的贡献将为-0.2 个百分点。产业升级将是全要素生产率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

在这一情形下，以 2010 年不变价格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 2030 年将达到 16,500 美元；根据目前世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在 2025 年将成为高收入国家。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可在 2026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以 2005 年的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在 2030 年将达到 26,000 美元，并将在 2016 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上述情形下，中国将和许多东亚经济体一样，在 30 年内完成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过渡。

超越低成本优势

中国经济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奇迹般成就也给她带来了许多挑战。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中国需要摆脱对低成本优势的依赖，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推动经济增长。而由于改革尚未完成，中国经济存在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如增长来源的失衡、收入差距的扩大、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与供给的制约、环境的恶化等，同时面临日渐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这些问题如不加以有效解决，有可能成为产业升级的重大制约。本报告探讨中国应如何应对所面临的问题、保证经济在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高速增长、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的远景目标是实现没有贫困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亚行的工作旨在帮助其发展中成员体减少贫困，改善生活质量。尽管亚太地区发展迅速，但该地区的贫困人口仍然占全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17亿人口日均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8.28亿人口挣扎在日均生活费1.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亚行致力与通过包容性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减少亚太地区的贫困。

亚行是一家多边开发金融机构，总部设在马尼拉，现有67个成员体，其中亚太地区成员48个。她主要通过政策对话，贷款，股本投资，担保，赠款以及技术援助等工具向发展中成员体和国家提供帮助。

Asian Development Bank
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www.adb.org